

JINDAI XINAN BIANJIANG MINZU DIQU
NEIDIHUA JINCHENG YANJIU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内地化进程研究

陈征平/著



人民出版社

JINDAI XINAN BIANJIANG MINZU DIQU
NEIDIHUA JINCHENG YANJIU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内地化进程研究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陈征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5822-8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西南地区-近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412 号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JINDAI XINAN BIANJIANG MINZU DIQU NEIDIHUA JINCHENG YANJIU

陈征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7-01-015822-8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的缘起和目的	1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2
三、对有关概念的使用范围及限度界定	5
第一章 1840 年以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依存关系	7
第一节 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7
一、意识形态上以儒家“教化”推动西南边疆社会的 行为观念同化	8
二、制度上以渐进模式推进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行政治理归一	11
三、经济上以农业一体化作为巩固西南边疆的物质基础	14
第二节 1840 年前后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经略现状	20
一、政治上西南边疆民族冲突长期延续与土流并治的维持	21
二、地理上交通阻滞,与内地交往困难	31
三、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同民族基本自成体系	37
第二章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发端	49
第一节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传统制度危机	50
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大清国运之逆转	50
二、中国传统制度面临的危机	52
第二节 西方“强制同化”与国内民族运动的高涨	61
一、直面西方列强入侵的民族抵抗运动	61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二、近代全球一体化驱动下反清政府的民族主义运动	71
第三节 近代西南边地界务与国家主权意识的激发	78
一、近代中国由纳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过渡的国际关系变化	79
二、近代中国领土权由“边陲”向“国界”之转化	81
三、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激发	84
第四节 西方思想、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 民族“国民”的 早期塑造	91
一、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确立促成边疆与内地社会的 同质性	92
二、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蛮夷”向“国民”的 转化	96
三、伴随西方宗教同化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103
第三章 近代交通、路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地化	111
第一节 西方经济一体化与西南边疆 近代交通意识的觉醒	111
一、英法对缅甸与中国西南边疆近代交通的一体化推行	111
二、西南边疆民族近代交通意识的觉醒	115
第二节 西南边疆民族的路权声张与自主建设	119
一、晚清西南边疆民族对路权的声张	120
二、清末民初西南边疆近代铁路的自主建设	129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近代交通建设的特点	135
一、近代西南边疆交通的突变与间断	135
二、抗战时期西南边疆近代交通建设的速成与时效	141
三、西南边疆近代交通建设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147
第四节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对少数民族内地化的牵引	156
一、早期路权声张浪潮对边地民族的席卷	157
二、近代交通权益维护中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自觉	160
三、抗战交通建设中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凝聚力的增强	164
四、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与内地关联度的提升	169

第四章 西南边疆近代工矿业离散、内敛与民族经济融合.....176

第一节 西南边疆近代追随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离散型工业路向176

一、中法战争是西南边疆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端176

二、民族主义与西南边疆的近代工业选择179

三、抗战前西南边疆被动追随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离散型
工业路向183

第二节 战时民族主义与国内经济的一体化运行188

一、西南边疆工业民族主义的历史源流188

二、战时国内经济一体化运行的促动因素190

第三节 战时由国内经济一体化牵动的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的 内敛化194

一、战时西南地区工业由边缘向中心转化是西南近代工业
趋于内敛的物质前提195

二、战时政府国营企业是西南近代工业由离散趋于内敛的
重要牵引力量196

三、战时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的内敛化197

四、战时国际交通运输工业对边地社会吸附力的增强200

第四节 近代工矿业产权运作中的西南边疆民族经济融合205

一、清末民初由股份公司促成内地与西南边疆的社会资本
融合205

二、民国由内地外来业者多元产权促成的西南边疆行业内
经济共生性融合211

三、战时国民党政府股权工具运作对西南边疆地方经济
板块的嵌入性融合217

第五章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商贸与国内经济一体化.....233

第一节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商贸的两种一体化选择233

一、近代西南边疆由边境贸易延展的西方经济一体化233

二、西南边疆由省际贸易牵引的国内经济一体化取向236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三、近代边地人民国家主权意识对西方经济一体化的牵制	239
第二节 近代“抵货运动”、“进口替代”与西南边疆民族商贸 结构及流向变动	242
一、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运动”及与内地的呼应	243
二、西南边疆的“国货运动”与“进口替代”方略	248
三、近代西南边疆进口替代下商品结构及流向变动	254
第三节 近代西南边疆难于持续的商贸运行特征	264
一、地区内贸易巨额逆差的普遍存在	265
二、进出口结构长期为初级产品交换机制加工品的格局	268
三、鸦片种、售在商贸活动中长期占有特殊地位	271
第四节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商贸的国内一体化趋势	283
一、民国初年西南边疆民族商贸国内一体化肇端	283
二、战时西南边疆民族商贸国内一体化发展	288
第六章 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 内地化	309
第一节 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举义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认同	309
一、19世纪中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举义事迹	309
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举义的民族主义内涵	312
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举义的中华国家认同	326
第二节 晚清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一体化推进	337
一、晚清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新浪潮	337
二、民国西南边疆边政及土司制度形态的历史终结	345
第三节 晚清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演进	354
一、晚清对西南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经济的一体化经略	354
二、国民党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均质化努力	372
结 语	416
主要参考文献	424
后 记	438

导 论

一、研究的缘起和目的

（一）研究的缘起

关于西南边疆内地化问题的提出，对笔者来说实非偶然。其最早可追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 1840—1949 年》（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期间，因大量查阅档案资料便已初步领悟到：近代云南地方对工矿业现代化的追求，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西方殖民扩张及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边地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利权，在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困乏及生产手段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畏艰难，疾声呼号，凭着一股民族自强的精神与豪气，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力量而最终为地方经济进步所奠定的一种早期的工业化基础。但在博士论文撰写工作结束后，因接受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地方经济史系列丛书”中《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的撰写任务，也就暂时地中断了对其作进一步的探究。然而也正是在对云南不同历史时段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每当云南边地与内地关系紧密之时，也同时是其工矿业得以较为迅速发展的时期，并由此而激发了笔者对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兴趣。因而在《云南工业史》一书历经 4 年的撰写工作完成后，遂于 2005 年申报并获批了《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也经过 4 年的潜心研究后脱稿。很显然，在研究了民国云南边省与中央的关系之后，对边疆与内地关系作进一步探究即成顺理成章之事。2010 年笔者即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了近代西南边疆社会剧变中其国际、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2

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下的内地化现象，拟定了“近代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一题。而当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申报，竟以重点项目获批时，无疑表明该论题的设计获得了国内专家的高度认可。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笔者学术研究水准的一次巨大考验，惶恐之余，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担当的压力。

（二）研究的目的

本书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近代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内地化检视，揭示出该历史时段关于西南边疆各民族的“中国认同”，并非一抽象的主观意识形态表象，而是其面对外来威胁，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为维护自身所关切利益而由衷迸发的历史选择。本书中主要以近代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共生现象为视点，揭示了在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西南边疆人民是如何在推进自身政治、经济变迁的同时，促成其加速趋于内地化（此在思想意识层面所折射者即是对中国的认同）之面相。即时值近代，当西方列强欲将中国瓜分豆剥地纳入其势力范围之时，孰料由过程中所激发的西南边疆人民国家主权意识的觉醒，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高涨，使西南边地人民一方面受中央政府力量的牵引，另一方面则通过自身由“边夷”向“国民”转化的自觉与诉求，以及近代交通、工矿建设和商贸等实际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了一股与西方列强侵略意图相悖的、建立在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地化动力，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内地更趋紧密的加速力量，亦前所未有地增强了边疆与内地的关联及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着力点有四：其一，对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内地化经略的概括性回顾（第一章）。大致分两个方面：一是梳理了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内地化之基本作为，包括意识形态上以儒家“教

化”推动西南边疆社会的行为观念同化；制度上以渐进模式推进边疆社会与内地的行政治理归一；经济上以农业一体化作为巩固西南边疆的物质基础。二是检视了1840年前后在历朝各代中央政权的长期经略下，西南边疆与内地关联度的既存现状，并将其具体归结为：政治上西南边疆民族冲突长期延续与土流并治的维持；地理上交通阻滞，与内地交往困难；经济上自给自足，各民族基本自成体系。

其二，从西方近代军事、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的碰撞中，揭示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的思想行为发端（第二章）。主要以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传统制度面临的危机，西方“强制同化”与国内民族运动的高涨，近代西南边地界务与国家主权意识的激发以及西方思想、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四方面内容作为主线。其中特别指出：近代西方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在造成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由“纳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过渡的同时，在西南边疆亦出现了中国领土权由“边陲”向“国界”的转化；以及对近代西南边疆人民国家主权意识的激发，而这一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觉醒，也最初地催生了边疆对与内地社会的同质性诉求，其重要表征是该期由西方宗教同化而促发的西南边疆“蛮夷”逐渐向“国民”转化，并据实梳理了其时该地区民族“国民”早期塑造的诸多表象。

其三，将晚清、民国西南边疆人民在近代交通、工矿建设及对外商贸活动中对边疆内地化推进的不同方式及特征作了较深入细致的剖析与归纳（第三、四、五章）。如交通方面：其促成西南边疆近代交通建设趋于内地化的动力，先是出于对法英滇越、滇缅铁路路权的维护与争持，为此有个碧石铁路的自主建设事，以及滇蜀、滇粤等铁路筹建之议；抗战时期其交通内地化的加速，则直接源于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工矿方面：先是民初国内政治裂变及地方势力膨胀，使该期西南边疆受国际经济一体化影响较巨，显现了一种离散态势；抗战爆发，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及中央政府向西南迁移，使该期西南边疆工矿发展呈现出内敛的势头，并迅速纳入国民党政府的规划轨道。而于工矿建设言，不管各期社会背景情形如何变化，从晚清至民国，基于中国传统及与西方公司制结合的产权运作下，从内地民间资本到国民党政府资本，都表现出了其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工矿

产权的日益渗透与相互融合的发展势头。对外商贸方面：近代由西南边疆人民国家主权意识及民族主义等声张，使面对国际、国内两个一体化选择中，趋向内地的动力明显强于国际化拉力。促成这一态势之动因，既有边疆人民源于自身的自觉，也有对内地社会的配合，如在不同历史时段对外国侵略势力所采取的诸如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以及对实现进口替代的不懈追求等。

其四，于政治层面在揭示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认同”事实的基础上，又梳理了晚清、民国政府承前启后的推进西南边疆内地化之作为（第六章）。即通过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起义这一由其亲历亲为（起义纲领、诗文、各种文献）的大事件，揭示出时值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主义”情愫及对“中国认同”的历史真实，并以此折射出历史上由国人上下一心的边疆内地化所获得的实际收效，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央政府的推动力可谓中流之砥柱。接着笔者又梳理了晚清、民国政府承前启后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的具体作为。就中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政府此间的行为方式差异较大，前者基本遵循历史上皇朝旧有的内地化经略模式，即以深化改土归流的地域范围为进取。后者由于此时国家政体制度已发生改变，而在前者改土归流所获成效基础上，使其首先于法理上造成边地土司制度的历史终结成为可能；紧其后因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国民党政府如何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达成与内地的均质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该期其均质化努力的成绩依然有限，但预示了关于未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取的一种内在趋势要求。

（二）重要观点

1. 对近代西南边疆的内地化研究，其实质就是探究近代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如何日渐达成与内地的均质化。
2. 近代西南边疆的“中国认同”是源于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时人对自身权益进行维护与声张的真切体念。
3. 近代交通建设是加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的强大物质载体。
4.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在抵御外来侵略势力过程中，该与内地商品交

换关系的持续扩大，亦极大地夯实了其“中国认同”及内地化进程的物质基础力量。

5. 近代西南边疆工矿业是循着“列强入侵→民族主义激发→近代工业发展”的递进轨迹，而获得民族经济进步与近代工矿业的改观的。

6. 近代西南边疆与内地由工矿业产权运作所形成不同所有者层面的经济融合，是边疆社会经济运行日趋内地化，也即边疆与内地社会经济运行不断趋于均质化的重要表征。

7.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所促成内地与西南边疆国民均质化水平的提高，既是近代国家制度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有着大中华民族观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在相应政策推动下，获得了一些具有指标参照意义的成效。

三、对有关概念的使用范围及限度界定

1. 关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外延及使用范围。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边疆照理应是指挨近国界的“沿边地带”，而这显然也是边疆学研究中用来界定何为边疆的重要依据。然由于该“沿边地带”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因而还得以人为的行政区划作为参照，如对西南边疆，边疆学指涉的范围一般就是沿西南边境的云南、广西等省。但当以该沿边地带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时，其不同少数民族靠内边的自然延伸，显然并不受人为的行政区划影响。如近代西方宗教对西南边疆苗族的渗透，就囊括了滇、黔、川边各苗寨。鉴于此，笔者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界域设定，亦只能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自然分布状况为依据，即由我国西南沿边境分布于滇、桂并自然延伸至川、康、黔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状况所决定的行政区划范围。^①当然，在实际的研究中，对所界定地域范围内的各该民族地区能否作平行的研究，显然还受到资料的限制。如历史上对广西的地域划

^① 对西南边疆界域的划定，当考虑到边地少数民族的因素时，似乎都自然地会采取较广义的界定方式。如研究指出：至明代，皇朝中央为满足重兵“守在四夷”的物质需求，亦伴随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此间，在统治者眼里的“西南边疆地区”，就“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川西南在内”。参见《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载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7页。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分,尽管其在经度上几乎与贵州平行,但习惯上却将其列入东南边疆或华南地区,以致与“江浙”的称谓相似,常常将“两广”视为同一地区。^①这也就造成在文本资料搜集上存在一定难度。又有,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几次调查,显然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档案资料,但从广西档案资料的馆存情况,或许由于桂系在民国初及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地位背景,亦缺乏与之对应的相关内容。^②如此诸多制约,也使本书关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为地区范围的研究对象,只能着重放在滇、黔,以及川、康等地,而关于广西,则主要是在资料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结合着进行研究。

2. 关于“西南边疆内地化”的内涵及使用限度。本书所谓“西南边疆内地化”,并非纯粹地理的概念,而是指在既定地理条件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疆域范围内,其边疆地带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在与核心区域社会相较下的质变过程。具体而言,即研究近代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既是地处边疆的边缘群体,又是中华民族国家之一员的双重身份下,他们是如何达成与内地核心区域社会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均质化演进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受政治、经济及人文诸多因素的制约,边疆社会就始终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尽管历代皇朝中央也曾对西南边疆的内地化采取过一些措施,如行政建置、设学、办理交通等,但目的亦仅是为维持既定的政治控制,而鲜有改变其生存状态之想。只是进入近代,因受西方列强的侵逼,西南边疆人民在谋求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之时,才深刻感悟到“没有国,哪有家”之楚痛,这种边缘化的自在状态亦被警醒,进而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亦在不同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中,都适时地显现出其力欲依托内地、展示边内一家以及力欲形成与内地声息相通的自觉。为此,也使在交通、实业、商贸、近代教育、社会风尚及思想意识诸方面,均显现了与内地日渐一体的变化趋势。据实言之,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这种与内地日趋均质化的获得,其动力源既有内地、特别是国家政治中枢的拉力作用,也有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由“中国认同”延伸的对“内地化”的不懈追求。

①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619页。

②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一章

1840 年以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与内地的依存关系

1840 年以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依存关系，是建立在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民族社会长达两千年内地化经略的基础之上，并据此而奠定了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意识形态的统属关系。但由于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演进，主要是皇朝中央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手段从内地核心区域向边地的持续推进并获得巩固，因而其更多的是表现了西南边疆社会的被内地化的一面。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生产技术及信息流通手段的局限，尽管从宏观上西南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是全方位纳入到皇权的控制范围；但微观上由各少数民族生产上的自给自足和传统交通条件所决定，使对外交往受限、地区相对封闭等现象依然是各少数民族社会的主流。

第一节 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其实质就是“处于从属”、“弱势”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为中原“强势民族群体”所吸纳和同化的过程。^①始于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途见蜀布、邛竹杖而意寻通身毒（今印度）之便道，即拉开了皇朝中央对西南地区内地化经略的序幕。唐朝羁縻州、县之设，意在保持各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基

^① 参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5 页。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研究

础上“进行贡纳的征收”。^①这亦为元、明、清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长达两千年的内地化经略，其演进的标识，不仅表现在殖边拓土之进取、行政治理的流土并存以及始于元代的“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并且还表现在其从“边郡”、“边州”演变为与内地“行省”的同级政区，及其由“边”变“内”的历史进程。^②

一、意识形态上以儒家“教化”推动西南边疆社会的行为观念同化

由于儒家文化源于前现代内地农业较高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典范。因而，利用财富及文化的典型功能对西南边地少数民族行为观念进行影响，亦成顺理成章之事。《左传》有云：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历史上“树统一之基者，实赖开化较早民族，将其文明，移植各地”。^③内中文明，显然包含物质和精神诸种。然当下之研究，尽管一般均认同儒家文明对中华民族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积极作用，^④却由于长期以来对儒家文明多从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研究或解读，无形中也使中国儒家文明似乎仅表现为思想文化层面的现象，而与其经济基础无关。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以“挑战和应战”思路来描绘各古代文明的形成、生长与衰落，认为技术于其间的无关紧要，以及特别强调宗教的意义时，则尤其强化了这种认知。^⑤然只要稍阅史料，则不难看出，历史上儒家文明得以由中原向周边持续扩散，离不开其以高度农耕技术为基础的物质财富的吸附作用。^⑥

①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页。

② 参见方国瑜、缪桀和：《云南郡县制度两千年》，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2页。

③ 转引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④ 如认为：历史上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或‘中央王国’”，乃与儒学“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德或活力”分不开。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与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⑤ 参见〔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7、74、92—93、242—243页。

⑥ 一种相反的例证，可以进一步证明其内在的密切关联性。即当近代对儒家传统学说进行批判甚或摒弃时，则又是由其时中国社会物质技术水平已大为落后于西方列强使然。

（一）传统儒家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我国早于“周之先世，盖皆以能修农业而兴者”，并且“唐虞之后，农业之盛，可以《书》之《无逸》为证”。^③儒家文明即是建立在这种农耕高度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据研究，“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发达，劳动生产率也是罕见的。远在汉代，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就为320亿斤，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人2000斤。唐代，粮食年总产量达595亿斤，宋代竟达1284亿斤”。^④外国学者亦言：若以1990年美元币值折算，公元960年中国人均GDP约450美元，欧洲约400美元；1280年中国人均GDP约600美元，欧洲约500美元。即“假定欧洲和中国在公元1世纪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⑤由此，史学界作为一种主流观点，甚至推定在中国宋代曾经出现过基于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经济革命。^⑥其时，由于国家经济基础的雄厚，“自唐宋特别是宋代，历元、明，直至清代，有关‘富民’的记载大量出现”，即于前现代，中国就已经出现过与当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类的富民阶层。^⑦正是受到中原前现代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生产成果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也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③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④ 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7页。

⑤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45、52页。

⑥ 尽管文章作者认为，关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是个假命题，但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则显然是不争的事实。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⑦ 参见林文勋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础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地处偏远的西南少数民族很早就成为以中国皇权意志为中心的族群依附体。如西南之邛、笮、冉、駹等接近蜀地之少数民族，由于交通较易，早于“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朝建立，“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① 研究也指出：早于汉代建立羁縻郡县时，汉皇朝就已使用财物拉拢的方式吸引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内附，即“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其时，如“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且听盟约”。^② 从而也使内地儒家文明持续向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扩散开来，并在唐代就形成由“慕华风”而“不劳一人蛮自通”的地区形势。^③

（二）主观上以儒家“教化”促成各少数民族的行为观念同化

所谓儒家“教化”，就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系统，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将王权主义的价值体系灌入人们的意识之中”。^④ 对此，亦有人认为：在中国各朝代更迭中，清帝国构建的儒家教化运动可称之为典范，其时，“儒家教化”不仅“是一个文明化进程”，也是“延伸清帝国统治的手段”。^⑤ 而从清代皇朝中央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记载中，其“教化”、“圣化”、“向化”等说法亦屡见不鲜。如顺治朝王弘祚曾撰《滇南十议疏》言：“滇省土司种类不一，俗尚各殊，……若一概绳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诚，……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另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怀德，自凜然贡奉同伦同轨之式矣。”^⑥ 康熙朝蔡毓荣撰《筹滇十疏》关于“制土人”一疏言：“臣请以钦颁六谕，发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齐赴土官衙门，传集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 117。

② 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4 页。

③ 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4、377 页。

④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9 页。

⑤ [美] John E. Herman：《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于晓燕译，载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216 页。

⑥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6 页。